

一篇珍贵的文献——毛泽东《论鲁迅》

唐天然

《毛泽东论鲁迅》是毛主席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记录稿，发表已经四十三年。这篇珍贵文献，是毛主席第一次评论鲁迅的文字材料。它版本颇多，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关于这篇文献，尚有一些问题，诸如纪念会情况，笔记发表经过，对记录稿的考察等等，都还需要进行研究。近年来，笔者曾就这些问题作了一点探索。值此鲁迅百年诞辰之际，现将一些情况写出，供研究者参考，并以此作为对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两位巨人的深切纪念。

纪 念 会 情 况

《毛泽东论鲁迅》最初发表时，文前有笔录者小引，第一句说：“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但是，关于纪念会的情况，我们至今却未看到任何文字资料。当时陕甘宁特区政府的《新中华报》，对陕北公学的筹备发起经过，毛主席给陕公的题词，和举行开学典礼等等，均有详细报道，独于此次纪念会却无反映。

查陕北公学系一九三七年七月底由党中央决定成立，十一月一日正式开学。从成立到开学，虽相隔三月，但当时，由于抗战形

势对人才的紧迫需要,陕公一边筹备,一边招生,七月成立,八月就接受了第一批学员。因此,陕公是上课在前,开学在后。而鲁迅周年祭日纪念会的召开,正是在陕公成立不久的先行上课,尚未正式开学之时。此点,大约就是延安报刊未作报道的原由。另外,据原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并《毛泽东论鲁迅》的笔录者汪大漠,及与他同时进入陕公学习的叶兆麒同志回忆,他们或者主持,或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因此,《新中华报》虽无报道,但纪念会的召开,当是无可置疑的。至于纪念会召开的确切日期,因无文字资料可考,不能具体断定。然而,既是周年祭日纪念会,想必召开于祭日当天或前后一两日。

关于会议情况,成仿吾同志虽已年逾八旬,还留有印象。汪大漠同志则更有深刻记忆。这次会议是成仿吾同志请了毛主席来校演说的。成仿吾同志说,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分头深入各单位参加会议,发表讲话。因为陕公初创,毛主席则更为关怀。^①“记得那天毛主席一早就骑了毛驴来参加会,我把他迎进屋里,坐了坐,说了会话,就一起去到会场。”那时陕公校址设在延安东门外的延河之滨,位于清凉山脚下的飞机场旁边。纪念会的会场在一间大屋里。会议的主持人是成仿吾校长。开会以后,他首先作了简短致词。接着,毛主席就起而演说。由于延安当时没有举行其它纪念活动,陕公召开的这个纪念会和毛主席的讲话,实际上是表达了整个陕北根据地的党和人民对鲁迅先生的悼念。

除了以上简单回忆,承叶兆麒同志函告说,当时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同志刚从国统区到达延安,也参加了纪念会。其它如会场如何布置,有无别的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等等,这些同志,以及笔者所能访问到的曾经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都记忆不清了。但是,据了解,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是党中央决定分工领导陕北公学的负责人。他后来曾出席陕公开学典礼,并继毛主

席之后讲话。鲁迅周年祭日纪念会，他很可能出席演说，但因无文字依据，只好存疑。

笔录、发表经过

据成仿吾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的多次演说，他们都曾指定专人记录。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当然也有校方的记录稿。但后来陕公一九三九年七月根据中央决定，和抗大、鲁艺合并挺进敌后办学时，将全部存档上交有关部门，后经辗转交递，寻找不着了。因此，陕公校方的鲁迅周年祭日毛主席的演说记录稿，现已无法查找。

所幸陕公第一期学员汪大漠同志，由于对毛主席和鲁迅景仰，个人作了详细记录，并将它整理发表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毛泽东论鲁迅》一文。

《毛泽东论鲁迅》发表以后，曾广泛流传。但是，后来人们却忘记了它的最初发表处。长期以来，不少人都以为该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阿英同志在上海主编的《文献》杂志。而且由于最初发表时，正文下面署名“大汉笔录”，故不少同志又都在寻访该文的笔录者“大汉”，甚至有人把“大汉”误传为就是阿英同志。一九七七年阿英同志逝世时，悼词中就列有他发表了毛主席这个讲话一事。一九七八年还有人专门向当时尚未获得自由的胡风同志进行提问，查询“大汉”是否即阿英。现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出版之《文献》卷之二，该刊确以《鲁迅论》为题发表了上述记录稿。诚然，当时上海正处孤岛时期，阿英同志不畏敌伪肆虐，勇敢宣传毛泽东思想，应加赞扬。但是，最初发表此文的，毕竟不是阿英；说笔录者就是他，则更是以讹传讹了。阿英同志从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战斗了一生，但他并未在延安工作过。

我们不应该抹煞胡风同志的贡献。《毛泽东论鲁迅》是胡风同志最初将它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武汉主编的《七月》杂志上的，较《文献》早八个月。由于胡风同志长期处于无权发言的地位，致使他的这一史实不为人们所知。

去年以来，笔者对《毛泽东论鲁迅》这篇重要文字开始进行探索。除查明该文出处，又致力寻找“大汉”其人。笔者发现，此文发表时，正文题目下虽署名“大汉笔录”，封面目录却署“大漠”。“漠”和繁体的“漢”，字形相似，两处署名不同，必有一处误植。因此，笔录者到底是“大汉”还是“大漠”尚待查考。不久，笔者翻阅武汉报刊，又在一九三八年《全民文化》上查到有署名“大漠”的文章；随后，又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武汉《新华日报》看到署名汪大漠当时访问延安群众团体的几篇报道。既名“大漠”，又到过延安，笔者从而确信，“大汉”实乃“大漠”之误。其时，正好接到梅志同志复信，承她见告说，胡风同志肯定，笔录者是大漠，不是大汉。更进一步证实了原先的推断。但关于“大漠”，胡风同志并不了解，未提供任何情况。笔者于是继续向当年在武汉《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同志调查。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得到吴奚如同志提示，且从徐光霄同志处了解到线索，找到了汪大漠同志。

汪大漠同志现年六十三岁，是水上运输高级法院筹备组负责人。他回忆了笔录整理和发表《毛泽东论鲁迅》的经过。同时，笔者又有幸读到胡风同志一九七八年所写答复外调者提问“大汉”是否阿英的材料抄件。至此，这篇文献的笔录发表过程，终于了然。

一九三七年七月，汪大漠同志从成都天府中学投奔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驻扎于陕西云阳镇三原县的红军一军团（很快改编为一一五师）宣传队工作了很短时间；八月间，就赴陕公学习。入学不久，他参加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汪大漠同志说，对于这个会，印象是深刻的。毛主席来讲话，大家很重视，加之鲁迅生前对

进步青年影响很大，自己又读过不少鲁迅著作，写过悼念鲁迅文章，因之对纪念会格外重视，于是详细地记录了毛主席的演说。当时由于学习紧张，未能及时整理。三个月后，他从陕公毕业，又到中央宣传部的文化训练班继续学习。训练班为了培养文化工作干部，组织学员访问了边区工会、八路军家属学校、托儿所等群众团体。访问时，汪大漠同志都作了札记。次年二月，他又被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新华日报》担任记者。但日寇大举进攻，武汉紧张，报社准备西迁。于是临时改变计划，把他介绍去南昌新四军办事处，随后，他就到了敌后。

在武汉逗留的几天，汪大漠同志抓紧空隙，将毛主席演说稿并一些访问记一并整理，交与了《新华日报》的吴敏同志。《边区的工人运动》等通讯稿很快陆续发表，而毛主席的演说被退回。报社表示：因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同志随即附以短信，寄给《七月》。二月发出，三月一日《七月》便迅速刊出，而且列为首篇。毛主席演说的记录稿就是这样和读者见面的。

胡风同志的材料，和汪大漠同志的回忆相印证。他提供了“几点确实情况”，说：稿子是从武汉本地寄来的；署名“大漠”，记忆很清晰；有笔录者附识，声明是毛主席的讲话；附有短信，说他是从延安出来的。

汪大漠和胡风两位同志，虽有文字之交，但并未见面。文章刊出后，正文下面的署名，误刊为“大汉”，汪大漠同志曾经看到，但他并未去信更正。他很快就去南昌了。而胡风同志，虽然确知笔录者是“大漠”，但他始终认为这是笔名。直到上述材料中，他还这样说：“‘大漠’当然是笔名。信上也不会写上本名。”并对笔录者的后来作了种种猜测。汪大漠和胡风同志曾经共同为保存和流传《毛泽东论鲁迅》这篇文献作出过贡献，这是我们要深深感激他们的。

对记录稿的考察

《毛泽东论鲁迅》一文，武汉《新华日报》当时所以未予刊载，主要是由于未经毛主席审阅，关键乃是在于考虑记录稿的可靠程度。后来，《七月》虽然发表，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现在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考察。

在胡风同志的材料中，曾经提到，《七月》杂志和延安的关系密切。他说，《七月》开始每期给八路军办事处二、三百本，托他们带进延安，分送和代卖。后来则由书店寄给少数在延安有关系的人们。此外，也常有延安的同志和八路军寄来的稿子。“所以《七月》在延安是被熟知和信任的”。现在，《七月》杂志俱在，查在武汉所出的十七期中，发自延安或报导边区生活的稿件就有十一篇，如第十八期的封面刊登了固林创作的“延安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场”的木刻，证明了胡风同志回忆的可信。

胡风同志不仅说明《七月》曾经进入延安，还进一步证明毛主席也读过《七月》。胡风说，其时刘雪苇同志从延安来信，“他提到了一件事：大概是他写信给毛主席请教什么，其中提到了我。毛主席回信中说《七月》很好，云云。他提到这件事，说这是《七月》的光荣。”而且，胡风同志还说，一九四五年他在重庆曾经见到毛主席，“他也说我过去的刊物，他是看的”。这些材料，足以证明《七月》进入过延安，毛主席读过《七月》，还加以称赞。毛主席既然读过《七月》，“大漠”的记录他应该也会看到。诚如胡风同志所说：“如果‘大漠’的记录有原则性的错误，他回雪苇的信中亦不会这样说的，甚至会提一下。”

毛主席演说记录稿发表以后，随着《七月》的进入延安，记录稿中的一些字句，在延安的一些报刊上也得到反映。其中最突出的

是毛主席关于“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这一句话，流传最广，引用最多。这一句话当时在延安几乎尽人皆知。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新中华报》发表肖三同志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其中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期《中国青年》，刊登了肖三同志的另一篇文章《鲁迅与中国青年》，也引用了这一句话：“鲁迅的天才和热情是多方面的。这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同志论鲁迅语）一生的事业，文章，异常浩大，异常雄厚。”这说明作者确信记录稿是可信的，而毛泽东同志也不可能不看到这些文章。

还有一条十分有趣而且颇具说服力的材料。上文提到，《新华日报》曾考虑未经毛主席审阅，未发表记录稿。但是，还是《新华日报》，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先生》时，其中就摘用了《毛泽东论鲁迅》中的话语：“毛泽东同志曾告诉我们，鲁迅先生有政治的远见，有斗争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这几个特点的综合，就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充分说明他们后来认定，记录稿是可信的。

除此之外，从记录稿本身，也可提出一点根据。毛主席在发表了这篇演说以后，时隔数天（十月二十三日），还给陕公写下了重要题词（见《新中华报》）。内容是论述先锋分子的必备条件。而这段题词，我们用来和记录稿的第一段对照，不仅内容完全一致，甚至字句也基本相同。这当然也不容置疑地说明了《毛泽东论鲁迅》一文的可靠性。

对讲话的认识

《毛泽东论鲁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毛主席最初全面评价鲁迅的文字。鲁迅先生逝世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党中

央在保安召开追悼大会，虽然据参加大会的同志回忆，毛主席曾在会上发表演说，但记录稿至今尚未发现。毛主席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但较之这篇演说，已是两年多以后了。

从这篇文献的内容看，毛主席在当时就对鲁迅作了高度评价。他没有把鲁迅的伟大功绩局限于文学的范畴，明确地指出了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称颂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而且，毛主席还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对原来左翼文艺队伍中抱有轻视鲁迅观点的一些人，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毛主席的演说，指出了鲁迅的三个特点，并把它概括为“伟大的‘鲁迅精神’”。他号召革命战士学习和运用它去促进抗日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这就把鲁迅化为伟大的精神力量，鼓舞革命者前进。几十年来，鲁迅精神确乎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

记录稿文前小引曾说，毛主席“对鲁迅是有研究的人，他读过不少鲁迅的著作”。冯雪峰同志生前曾对访问者说过，还在中央苏区时，当时鲁迅还健在，毛主席就专门和他谈起过鲁迅，包括他的思想和著作。毛主席对鲁迅确乎颇有研究。我们也可从演说本身得到印证。在记录稿中，毛主席引用了鲁迅的三篇著作。其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则是一九三六年七月才发表的，毛主席就已经读过。最突出的，是毛主席引用的痛斥变质者的那封信。此信是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写给肖军同志的。毛主席何以会知道呢？笔者曾就教于肖军同志。肖军同志说，鲁迅逝世后，他曾将鲁迅写给他和肖红的信，选择了九封，略加注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大约后来流传到延安，毛主席便读到了。因此，《毛泽东论鲁迅》一文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主席对鲁迅著作的充分

重视，鲁迅的许多重要著作，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

流传和影响

毛主席的演说稿在《七月》发表后，同年五月，《新语周刊》便转载。八月，上海新文出版社出版之《鲁迅新论》也予转载。十一月，上海《文献》又作为“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的文章发表。之后，许多报章杂志都辗转刊载。如一九四六年十月卢正义主编的《鲁迅论》和东北文化社编印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都进行了刊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出版的《东北文艺》也发表。到解放初期，又为一九四九年十月南京出版的《新华周报》刊登。一九五〇年一月胡今虚编辑的《论鲁迅》一书也曾辑入。唐弢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还说到，解放后有人曾搜集到上海地下党时期此文的油印本。除此，各种版本尚多。解放初期还选入高中语文教科书。

长期以来，由于辗转流传，毛主席的讲话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上文提到，《新华日报》社论和肖三同志的文章曾引用其中语句，李何林同志一九三九年编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时，序言中也曾提到“鲁迅则是新中国圣人”。这一句话甚至被日本研究鲁迅的学者竹内好一九四七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引用。解放以后，《人民日报》刊登的纪念鲁迅的文章，也引用过另一段话。总之，大量史料证明，毛主席这篇演说辞，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毛主席的演说稿，在辗转刊载的过程中，题目常有改动，文字也时有删节，加之口传手抄，讹误颇多。过去，由于不明笔录发表经过，无所依据，原不足怪。而今，真相已经大白。笔者认为，对于这篇文献，今后如继续刊载或引用，应以《七月》为据，俾使读者能够了解它的历史原貌，这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一九八一年八月

注：

①查资料可知，毛主席除参加这次纪念会，在这之前几天，曾亲自审处了黄克功枪杀陕公女生的案件；十月二十三日又为陕公题词；十一月一日，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

〔编者附记〕 本文中所叙的“《毛泽东论鲁迅》，”均应为“毛泽东《论鲁迅》”。因付印在即，不便改动，敬请读者谅解。

一张珍贵的革命报纸——《救国日报》第一号

《救国日报》是1932年在南京创刊的。它的社长兼主笔龚德柏以一贯反共而受到国民党领导层的赏识，称他为“龚大炮”。

南京解放前夕，“龚大炮”逃跑了。这家报纸的进步职工却早已同南京的革命群众一起，在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做好了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救国日报》第一号的出版，就是这一革命行动的记录。

毛主席1949年4月24日在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中说：“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这张报纸于新华社发表上述消息的同日，刊登了《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电毛主席请速令解放军和平接收南京》的电报全文和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通告，过渡时期办法等。从这张报纸上可以看出我党在南京的地下组织的力量是坚强的。

《救国日报》第一号是仅存的只出刊过一天的反映南京革命斗争史实的珍贵报纸。

刘世杰